

胡德坤 主编

#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 第六卷 战时美国对华政策

陶文钊 | 主编

#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 第六卷 战时美国对华政策

陶文钊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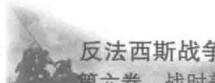
# 目录

## Contents

### ※ 第六卷 ※

### 战时美国对华政策

引言 .....	1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与美国对华政策 .....	7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不承认主义” .....	7
一、美国对事变的判断 .....	7
二、日本轰炸锦州与美国的反应 .....	11
三、国联会议与李顿调查团的成立 .....	16
四、“不承认主义”声明 .....	20
五、“一·二八”事变与列强调停 .....	22
第二节 棉麦借款 .....	28
一、借款的磋商 .....	29
二、美国国内的不同意见 .....	32
三、中国的反应 .....	34



四、日本的反应 .....	37
五、《天羽声明》及赫尔照会 .....	42
<b>第三节 《中美白银协定》 .....</b>	<b>47</b>
一、美国的白银政策 .....	47
二、中国的反应 .....	50
三、中国酝酿币制改革 .....	54
四、美、英的干涉 .....	58
五、《中美白银协定》的订立 .....	60
<b>第二章 突破孤立主义的桎梏 .....</b>	<b>66</b>
<b>第一节 七七事变与罗斯福的芝加哥演说 .....</b>	<b>66</b>
一、赫尔声明 .....	66
二、国联会议 .....	70
三、罗斯福芝加哥演说 .....	76
四、布鲁塞尔会议 .....	80
<b>第二节 道义禁运 .....</b>	<b>87</b>
一、中立法与中日战争 .....	87
二、道义禁运 .....	93
三、格鲁照会反驳“东亚新秩序论” .....	99
<b>第三节 桐油借款·美国修改中立法 .....</b>	<b>103</b>
一、桐油借款的达成 .....	104
二、美国废止《日美商约》 .....	114
三、美国修改中立法 .....	120
<b>第四节 华锡借款与钨砂借款 .....</b>	<b>124</b>
一、华锡借款 .....	124
二、钨砂借款 .....	129
三、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支持中国抗战 .....	132
<b>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前夕的美国对华政策 .....</b>	<b>143</b>
<b>第一节 美国开始对华租借援助 .....</b>	<b>143</b>
一、居里访华 .....	143

二、《租借法》与中国 .....	147
三、飞虎队的组建 .....	152
<b>第二节 美日谈判 .....</b>	<b>155</b>
一、日本的南下方针与美日谈判 .....	156
二、美国冻结日本全部资产 .....	161
三、美日谈判的破裂 .....	166
<b>第三节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b>	<b>174</b>
一、斯诺与《西行漫记》 .....	174
二、美国记者在苏区 .....	178
三、卡尔逊访华 .....	182
四、美国与皖南事变 .....	187
<b>第四章 太平洋战争与美国对华军事合作与援助 .....</b>	<b>193</b>
<b>第一节 美中军事合作关系的确立 .....</b>	<b>193</b>
一、军事合作主张的提出 .....	193
二、重庆军事会议的召开 .....	200
三、中国战区的建立 .....	203
<b>第二节 第一次缅甸战役与史蒋分歧 .....</b>	<b>208</b>
一、第一次缅甸战役与美国的对策 .....	208
二、“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及其困境 .....	215
三、居里第二次访华 .....	220
<b>第三节 缅甸反攻与史迪威的召回 .....</b>	<b>226</b>
一、缅甸反攻与盟国内部的纷争 .....	226
二、对华空军援助与陆战、空战之争 .....	237
三、中国正面战场的溃败与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 .....	244
<b>第五章 美中特殊关系的形成 .....</b>	<b>254</b>
<b>第一节 美国对华贷款、租借援助与修约 .....</b>	<b>254</b>
一、5亿美元贷款 .....	254
二、美国对华租借援助 .....	261

三、美中新约的缔结 .....	268
<b>第二节 开罗会议与美中特殊关系的形成 .....</b>	<b>277</b>
一、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的设想与开罗会议的酝酿 .....	278
二、美中的“开罗构想” .....	284
三、美国废除《排华法》 .....	290
<b>第三节 美国在联合国问题上的对华政策 .....</b>	<b>295</b>
一、罗斯福关于联合国的构想 .....	295
二、莫斯科外长会议与《普遍安全宣言》 .....	298
三、美国支持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 .....	303
<b>第六章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b>	<b>312</b>
<b>第一节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 .....</b>	<b>312</b>
一、美国派观察组赴延安 .....	312
二、观察组与中共领导人 .....	317
三、观察组的报告 .....	324
<b>第二节 赫尔利调处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 .....</b>	<b>330</b>
一、赫尔利介入国共调处 .....	330
二、赫尔利出尔反尔 .....	333
三、美国使馆人员的不同意见 .....	342
四、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	345
<b>第三节 结束战争及战后的安排 .....</b>	<b>349</b>
一、美国与雅尔塔会议 .....	349
二、美国与中苏条约的谈判 .....	356
三、战争结束与杜鲁门“一号命令” .....	363
<b>本卷综论 .....</b>	<b>370</b>
<b>参考文献 .....</b>	<b>388</b>
<b>后记 .....</b>	<b>401</b>

# 引言

本卷阐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后15年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早在19世纪末，针对列强争夺中国的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美国提出了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指望把自由主义的原则引进到各国对华关系之中，进而拓展美国在华势力。但实际上，美国在东亚的力量当时远远不如别国，尤其是日本咄咄逼人地在亚洲大陆扩张势力，美国没有打算也没有可能用武力保卫门户开放政策。因此，在20世纪的头20年中，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步步紧逼，美国节节退让，1905年的《塔夫特—桂太郎协定》、1908年的《罗脱—高平协定》、1917年的《蓝辛—石井协定》以及在凡尔赛和会上威尔逊总统在中国山东权益问题上对日本的让步，就是这20年中日、美在东亚地区争夺的几个重大事件的见证。

但日本的扩张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也损害了列强各国的利益。因此，第一次大战结束不久，各国就在美国的倡议下于1922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议，并达成了《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门户开放原则第一次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并具体化为一项国际条约。这是东亚国际局势的重要发展。一个新的国际格局，即所谓华盛顿体系形成了，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打破的列强之间的均势得到恢复，列强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准则常常受到局部破坏，但毕竟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公然废弃它；在对华关系方面，列强恢复了协调一致的政策，中国又回到受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

华盛顿体系维持了将近十年。在这个时期，日本隐忍待时，但它独霸东亚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及至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衰退发生，西方各国自顾不暇，日本



便发动九一八事变,对这个体系提出公然挑战。正如日本可以预料的那样,处在经济危机中的西方各国以及国际联盟对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的反应是软弱的,各国不能联合起来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径。在各国中,最强硬的要算美国1932年1月7日发表的“不承认主义”声明了。这个声明表达了美国不承认因为九一八事变所改变的现状,为美国预留了日后采取行动的可能。

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分界,从1931年到1945年的15年自然地分作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美国政府,主要是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在艰难地实现从所谓“中立”到制日援华的转变;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是共同抗击法西斯的盟国关系。

前一时期的美国政策转变是很艰难的。罗斯福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受到国内和国际的多重制约。首先是国内的大衰退,国民经济面临着整体崩溃的危险,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种族矛盾空前激化,国家被前所未有的悲观情绪所笼罩。罗斯福政府的主要精力和资源毫无疑问只能用在挽救国家经济上。其次是国内的孤立主义。这种孤立主义既是向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回归,又由于经济危机而变得愈发严重。罗斯福坚定但也是小心翼翼地与孤立主义作斗争,然而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孤立主义才被最后扔进了太平洋里。再次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和竞争压力。苏联在对抗资本主义的联合干涉中站稳了脚跟,苏联的发展对资本主义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最后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被经济危机所吞没,华盛顿体系、各国之间协调一致的努力处于最软弱的时期,尤其是英国张伯伦内阁对德国法西斯完全采取了绥靖政策。在列强各国中,美国对中日冲突的政策比较起来算是最强硬的。美国总的政策趋向是在逐渐向着制日援华的方向转变,尽管其中有曲折,有反复。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两国是盟国关系,但中美关系远不是亲密无间,实际上有的学者形容两国是“争吵不休的伙伴”<sup>①</sup>。但这主要是指军事层面。在政治上,通过这种盟国关系,两国建立了特殊关系。<sup>②</sup>这种关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罗斯福从他关于战后国际格局的设想出发,需要中国继续作为美国的盟国,在亚太地区发挥主要的稳定作用。而蒋介石则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认定要唯美国马首是

<sup>①</sup> 如见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sup>②</sup> 美国有的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历来是特殊关系,可参见韩德著、项立岭等译的《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但笔者认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美两国关系未必有多少特殊性,真正非同一般的关系是在两国结盟之后才建立起来的。

瞻,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战后,都要依从美国的领导。这种特殊关系主要表现在:美国不顾苏联和英国的反对,极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蒋介石本人的地位,并在战后东亚事务中倚重中国的意见;国民政府对美国作出了关于战后关系的承诺;美国在战争末期对中国内政介入之深是中国近代史上任何外国都没有过的。

关于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和中国两国历史学界长期研究的课题,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在美国方面,已故前辈东亚问题专家多罗西·博格的《美国与1933—1938年远东危机》<sup>①</sup>是关于从《塘沽协定》到1938年年初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著作。作者指出,在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以前美国的政策重点是要维护国际体系,即华盛顿体系,美国支持国联采取行动;在该协定订立后,美国政策的主调是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如果国际社会要干预事态,美国应让别的国家或组织采取主动,对美国利益来说最好是不采取行动,《天羽声明》也不能使美国政策发生改变。该书分析了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分析了国务院和财政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并指出,在1935年到1936年,美国政策依然是,美国要尽量避免采取可能被解释为进行干预的行动,甚至避免作出这样的表态,美国仍然非常不情愿卷入当时中国的危机。七七事变使美国再次面临选择:是继续孤立主义,还是采取国际主义路线。国务卿赫尔的战略是道德说教,表示反对侵略,但不指明谁是侵略者,同时避免采取对日本的强硬行动。1937年10月初罗斯福发表了“防疫隔离”演说后,罗斯福本人就成了美国政策的主导者。对此后罗斯福的政策,美国学者间也有意见分歧。该书作者认为,罗斯福仍然在寻求一种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以制止战争,而不要进行军事制裁。华盛顿的基本政策仍然是不采取行动。

菲斯的姐妹篇《通向珍珠港之路》与《中国的纠葛》是研究这一时期美中日三边关系的代表作。<sup>②</sup> 菲斯是国际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并且先后担任过国务

<sup>①</sup>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sup>②</sup> Herbert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The Coming of the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该书的中译本是[美]菲斯著,周颖如等译:《通向珍珠港之路——美日战争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该书的中文译本是菲斯著,林海、吕浦、曾学白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院和陆军部的顾问，参加过多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因此比一般学者更了解解决策过程。他在离开国务院后，由于是前官员的原因，得以使用当时尚未解密的国务院档案，以及大量当事人的笔记、记录、日记等原始材料。除了与政界高层的接触，菲斯还得采访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如杜鲁门、哈里曼、高斯、格鲁、宋子文等，因此在同类著作中，菲斯著作的资料格外翔实。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美国政界一直存有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白皮书》的公布也不能平息这场辩论。国务卿艾奇逊鼓励菲斯写作此书，该书也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国务院的观点，或者说美国历史学界主流或曰传统的观点。

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sup>①</sup>概括了更长的历史时期。此书的观点是挑战传统的。沙勒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制定了一项不幸的对华政策，美国决策者未能听取史迪威、戴维斯、谢伟思等人的意见，一味偏袒国民党，排斥共产党。这项政策不仅影响了战时的两国关系，而且在战后美国对待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亚洲的革命运动上仍然受到原来政策的影响，直至最后丢失中国。沙勒探讨了是什么因素使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偏见、为什么美国各派力量会卷入国共两党的斗争、中美关系有没有别的可能性等问题。

有相当多的学者研究探讨了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延安与大国》的作者詹姆斯·里尔登·安德逊<sup>②</sup>是其中之一。后来的研究者像当初美国军事人员对延安感兴趣一样，对当时美军人员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颇感兴趣，因为这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发生正式关系。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埃谢里克编的《在中国失掉的机会》<sup>③</sup>。编者把谢伟思作为延安观察组成员时期发出的报告进行了编撰，予以出版，使我们今天仍能充分利用这些材料，领略谢伟思的睿智。

还有一些著作不是专门研究美中关系的，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容在其

<sup>①</sup> Michael Schaller, *The U. S. Crusade in China, 1938 – 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该书的中译本是：[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sup>②</sup> James Reardon-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 – 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sup>③</sup> John Service, *Lost Chances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比如《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sup>①</sup>、《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sup>②</sup>。前者将对华政策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全局中,对许多问题,如两国特殊关系的构建有相当精当的论述。霍普金斯是罗斯福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顾问,参与了罗斯福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包括对华政策的决策的起草和制定。这两本书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不可或缺的。

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有两位至关重要的美国人,即史迪威和赫尔利。关于他们的研究,也有很多。中缅印战区历史学家罗曼纳斯和桑德兰所著的三卷本<sup>③</sup>对战时两国的军事关系、对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研究。由于作者的身份,书中的资料特别丰富。作者的观点基本反映了美国官方的看法。著名史学家塔克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sup>④</sup>是一本功力很深的著作。此书从1911年刚刚发生辛亥革命时年仅28岁的史迪威来到中国写起,一直写到1946年10月史迪威病逝。全书不仅展现了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画面,而且对史迪威的个人性格、对史迪威与美国和中国重要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有生动的描述。关于赫尔利的著作,有两部:洛贝克的《帕特里克·赫尔利》<sup>⑤</sup>与布哈特的《帕特里克·赫尔利与美国外交政策》<sup>⑥</sup>。这两部著作都把赫尔利1944—1945年间出使中国作为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决策者和当事人的回忆录也为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

<sup>①</sup>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 – 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该书中文译本是[美]罗伯特·达莱克著,伊伟、丁耀林、张震久、陈启迪译,白自然校:《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sup>②</sup> 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该书中文译本是[美]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sup>③</sup>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3;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1956; *Time Runs out in CBI*, 1959.

<sup>④</sup>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 – 1945*,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0. 该书的中文译本是[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王祖通校:《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sup>⑤</sup> Don Lohbeck, *Patrick J. Hurle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6.

<sup>⑥</sup> Russel Buhite,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了重要资料,包括摩根索<sup>①</sup>、赫尔<sup>②</sup>、史汀生<sup>③</sup>、哈里曼<sup>④</sup>、史迪威<sup>⑤</sup>、魏德迈<sup>⑥</sup>的回忆录、日记等。

中国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和论文,都相当丰富。<sup>⑦</sup>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和中美关系史<sup>⑧</sup>研究的三部分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许多年轻学子也以此作为他们博士或硕士论文的题目。对于各个重大的事件,如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政策、美国的白银政策及其对中国币制改革的影响、抗战初期的对华政策、1941年的美日谈判、美国对华援助、史迪威事件、战时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抗战末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等,学者之间几乎都展开过热烈的争论。<sup>⑨</sup>本卷正是在借鉴已有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书中大量使用了《美国外交文件》等第一手资料,展现了美国对华政策错综复杂、色彩斑斓的画面。

① Henry Morgenthau, *Morgenthau Diary,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4.

John M. Blum, ed.,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Years of Crisis, 1928 – 1939*,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9.

②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48.

③ Henry L. Stimson,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7.

④ W. Averell Harriman and Ell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 – 1946*,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该书的中译本是[美]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合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⑤ Joseph W. Stilwell, *The Stilwell Papers*, Arranged and Edited by Theodore H. White,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Inc., 1948. 该书的中文译本是[美]约瑟夫·史迪威著,黄加林、张红叶、陈宇、米小平译:《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⑥ 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8.

⑦ 参见赵文亮:《二战研究在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⑧ 主要著作有,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关绍纪:《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韩永利:《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胡德坤、韩永利:《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⑨ 参见资中筠、陶文钊主编:《架起理解的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与美国对华政策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不承认主义”

### 一、美国对事变的判断

1931年9月18日夜，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在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于当晚占领沈阳全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虽然是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发起的，但它无疑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满蒙政策”的必然产物。中国内部的混乱政局和东北军事力量的虚弱，使日本得以加速实现其侵略政策。<sup>①</sup>

对于事变的爆发，中国政府事先已有所察觉，而美国方面未有准备。事实上，中国政府于1931年9月11日就向美驻华公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提出警告：日本将于三个月以内军事占领“满洲”。然而，詹森不以为然，他认为，尤其在日本能够开发利用“满洲”而又无须承担所有行政管理费用的情况下，由日本主动采取这种行动“非常不可能”。结果，这个情报直到10月1日才发

<sup>①</sup>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75—381页；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5页。

出,10月26日才传送到美国国务院。<sup>①</sup>

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关东军迅速扩大了对东北的军事占领,这促使美国驻华的外交官们在几天内就初步认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结果。在9月21日、22日拍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詹森认为,日军在事变以后迅速占领了长春、牛庄、安东、沟帮子、葫芦岛这些彼此相距甚远的地方,这需要事先有一定程度的参谋和准备工作,而且日军还迅速将其司令部由旅顺转移到了沈阳。因此,日军的行动是“蓄谋已久的、精心地、有步骤地加以实施的侵略行为”。因此,他主张《非战公约》签字国向世界公开表明,日本已经完全违背了它作为公约签字国负有的条约义务。<sup>②</sup>

对于美国而言,远东危机的意义不仅在于日本侵犯或威胁了美国的具体利益,更重要的是它企图以武力实现其国家政策,强行调整国际关系的现有框架。这严重挑战和动摇了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积极倡导的建立在国际仲裁、集体安全、民族自决、自由贸易、裁军等原则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挑战了华盛顿体系,危及远东的和平,<sup>③</sup>美国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然而,包括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官员此时并不主张公开谴责日本。这首先是由于他们对日本文官政府抱有幻想。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Shidehara Kijuro)推行所谓的“协调外交”,即在维护日本利益的前提下,争取与列强的合作,在美国所倡导的海军军备限制、《非战公约》等问题上积极予以配合,博得了美国的极大好感。因此,他们相信“这次事变未经日本文官政府的策划和认可,而很可能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与币原所推行的“通过商业扩张和政治上的善邻友好

<sup>①</sup> “Memorandum by the Minister in China (Johnson) of a Conversation with Dr. John C. Ferguson, Adviser of the Executive Yua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September 11, 1931,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31, Far East*, Vol. III,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p. 3.

<sup>②</sup> “The Minister in China (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22, 1931, *FRUS, Japan, 1931-1941*, Vol. I,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p. 5.

<sup>③</sup> 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页。

来实现日本发展”的整个政策是背离的。<sup>①</sup> 所以，此事的性质，从中日关系上看，“并非两国政府的冲突，而是他们下属之间的对抗”；<sup>②</sup> 从日本国内政局上看，则是温和的文官政府与极端军国主义分子的两条路线之争。

史汀生还认为，九一八事变虽然由日本关东军发动，但根源于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冲突。在他看来，“满洲”是一块地广人稀的土地，虽然法理上属于中国，但一直以来未被有效占领。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以来，日本付出了高昂代价，夺取并开发了“满洲”，只是未能实现大量移民；与此同时，中国逐渐意识到了“满洲”的经济重要性，近三千万中国农民涌入并占据了“满洲”，由此酿成了两国的争端。这样，本来十分清楚的中国领土遭受日本入侵这一事件的性质被模糊了，而中国抵御侵略、收回自己领土权益的正当性则被淡化了。美国官员持这种看法，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正当的民族诉求并不赞成和同情，事实上不承认中国有权利收回自己的权益。

基于上述考虑，在事变初期，美国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避免任何可能刺激日本的尝试，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控制局势，制止事态的扩大；同时，以谨慎的方式推动中日双方直接谈判，以期事态能够像1929年中东路事件一样自行解决。<sup>③</sup> 史汀生告诫美国新闻界要谨慎从事，不要在报刊上登载可能激起美国人和日本人情绪的文章。<sup>④</sup>

1931年9月22日，史汀生召见了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他表示相信币原，称美国政府注意到了日本文官政府与军部的分歧，将“增强而不是削弱币原的力量”。同时他也提出，由于日军事实上占领并控制了“南满”，“消除现有事态的责任主要在日本方面”，告诫日本要注意“满洲”局势在美国可能引起的反响。<sup>⑤</sup>

<sup>①</sup> Henry L. Stimson,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pp. 33–35.

<sup>②</sup> “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urrent Information (McDermott) of the Press Conference on September 19, 1931”, *FRUS, 1931, Far East*, Vol. III, p. 15.

<sup>③</sup> 中东路事件是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在中东路上发生的外交纠纷和武装冲突。史汀生似乎对美国在中东路事件中的表现非常满意，并且过分高估了国际舆论在中苏决定停止冲突中的作用，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此事作为国际社会和平解决争端的范本被反复提及。

<sup>④</sup> Henry L. Stimson, *The Far Eastern Crisis*, p. 37.

<sup>⑤</sup>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22, 1931, *FRUS, Japan, 1931–1941*, Vol. I, pp. 5–8.

而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反应非常冷淡。事变以后,中国政府把制止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和美国的干预上,积极采取外交行动。1931年9月19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即遵照外交部训令,将日本军队突然攻击沈阳并加以占领的情况通告国联秘书处,吁请国联立即依照盟约采取措施,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递交了申诉。<sup>①</sup>国民政府又连连照会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援引《非战公约》,制止日本侵略。然而除了24日的同文照会呼吁双方节制,美国并无其他外交行动。22日,中方又通过美国驻南京总领事佩克(Willys R. Peck)询问关于史汀生已经表示“不援引《非战公约》”,且日军在行动前已“事先征得美英同意”的传闻,可能意在促使美国作出明确表态,而史汀生只极简短地否认了以上两点,不作任何其他评论。<sup>②</sup>说到底,这也还是为了避免刺激日本,或许也因为不愿增加中国的外交筹码,从而加大美国敦促双方妥协的难度。

美国也与国联互相推诿责任。史汀生十分怀疑国联的动机是企图将“皮球踢给美国”,因此,坚持美国只能有限地与国联合作。他给美国驻日内瓦公使休·威尔逊(Hugh R. Wilson)规定的行动路线归纳起来是:第一,支持国联敦促中、日两国通过直接谈判自己解决问题;第二,如需外界采取行动,那就支持中、日两国把问题提交国联;第三,如仍不奏效,美国再考虑根据《九国公约》或《非战公约》采取可行的办法。<sup>③</sup>

美国政府不仅自己谨小慎微,还阻止其他国家采取任何在它看来可能刺激日本的行动。1931年9月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国联行政院提议,组织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国联初步同意,并邀请美国参加。史汀生并不反对调查团,但他认为外国派出的调查团可能“煽起日本的民族情绪”,损害币原在日本国内的地位,因而坚决主张调查团只能由争端双方共同任命。于

<sup>①</sup> 《外交部致日内瓦施代表等电》(1931年9月19日),《我驻日内瓦施代表照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1931年9月2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321—324页。

<sup>②</sup> “The Minister in China (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22, 1931, *FRUS, 1931, Far East*, Vol. III, p. 27;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nsul General at Nanking (Peck)”, September 22, 1931, *FRUS, 1931, Far East*, Vol. III, p. 30.

<sup>③</sup>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2000)》(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123页。

是，国联又提出另一个方案：由中、日两国各指派 2 名代表，由国联行政院指派 3 名代表，组成调查团，并再次邀请美国。史汀生仍然担心日本的态度。他坚持认为，最好由国联采取外交途径，要求中、日双方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问题。如果谈判不成，国联可根据盟约采取适当行动，美国则给予“一切道义上的支持”。如果还不成，则美国考虑援引《九国公约》或者《非战公约》。他还怀疑国联会利用美国的表态对日本施压，因而坚持只有在中、日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美国才能决定是否参加。25 日，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反对国联调查团。此事也就再未提及。可以说，正是由于日本的阻挠和美国的干涉，中国政府关于派遣中立调查团的要求迟迟没有实现。

9月30日，国联行政院通过决议。核心内容是，要求中、日双方避免冲突，日本承诺把军队撤到满铁区域以内，中国则负责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中、日两国代表都在决议上签了字。<sup>①</sup> 日本方面也接受了美国 28 日提出的派遣美国外交官赴“满洲”调查的要求。对此，史汀生深受鼓舞，认为“冲突就要合理结束”，不仅币原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政策，而且中日争端也将在双方都满意的情况下平稳解决。<sup>②</sup>

要而言之，在事变爆发的初期，美国政府虽然认识到事变是由关东军蓄意发动的，但过分信任日本文官政府控制国内政局的意愿和能力，试图以“完全的中立”拉拢中、日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达成妥协，从而扭转局势。这种一厢情愿的幻想不仅使美国消极对待中日冲突，而且阻碍了中国和国联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制止侵略的扩大。关东军利用中国的不抵抗、美国和国联的消极观望，在东北不受干扰地攻城略地，肆无忌惮地扩大侵占范围。在事变后的一周内，日本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多座城市，接着又北犯黑龙江、南侵辽西，“满洲”的局势急剧恶化。

## 二、日本轰炸锦州与美国的反应

1931 年 10 月 8 日，关东军的 12 架飞机对辽西重镇、辽宁省政府和东北边

<sup>①</sup>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Counci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on September 30, 1931”, *FRUS, Japan, 1931 - 1941*, Vol. I , p. 14;《国联行政院九月三十日决议案 行政院会议主席白里安提出决议草案》(1931 年 9 月 30 日),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一), 第 327—328 页。

<sup>②</sup> Henry L. Stimson, *The Far Eastern Crisis*, p. 50.